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DU
TONKIN AUX
INDES



云南游记

——从东京湾到印度

[法]亨利·奥尔良◎著
龙云◎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云南游记

——从东京湾到印度

〔法〕亨利·奥尔良◎著
龙 云◎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 / (法) 奥尔良著；
龙云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8
(行走中国丛书)

ISBN 978 - 7 - 222 - 13272 - 6

I. ①云… II. ①奥… ②龙…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3304 号

出品人
胡平
项目负责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王韬 毛雪
责任校对 郑燕燕
装帧设计 王曦云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
〔法〕亨利·奥尔良 著 龙云 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23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出版印刷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号 ISBN 978 - 7 - 222 - 13272 - 6
定价 40.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 - 64164626 出版部电话：0871 - 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

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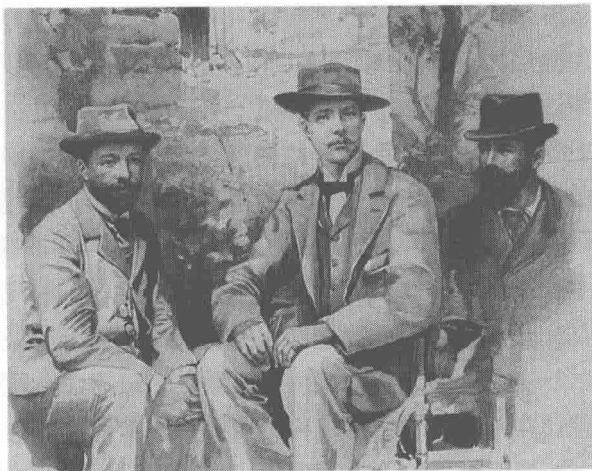
是为序。

2015年5月

译者的话

亨利·奥尔良王子（Prince Henri d'Orléans, 1867—1901）出身于法国奥尔良家族，他是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曾孙，也是摄影家、画家、作家、探险家、自然主义者。

亨利·奥尔良从小就喜欢冒险和打猎，一开始他本希望投身军旅。1886年，他已经通过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但是那一年法国刚刚通过《流亡法》，军校的大门向曾经的法国王室成员关闭，亨利·奥尔良也与军队失之交臂。1887年9月到1888年3月，他先后在恒河三角洲和尼泊尔探险行猎。随后，他前往日本。1889年到1890年，他与邦瓦洛



从左至右分别为鲁克斯、亨利·奥尔良和布利佛

（Gabriel Bonvalot, 1853—1933）穿越欧洲、西伯利亚、中亚来到新疆，最后抵达距离拉萨 60 公里的地方，因此亨利·奥尔良也是最早进入西藏的欧洲人之一。其后，亨利·奥尔良取道四川、云南，于 1890 年 9 月抵达河内。1892 年，他与邦瓦洛出版记述此次探险历程的游记《勇闯无人区》，其中的配图照片均由亨利·奥尔良完成，这些照片生动地再现了这次长达 6700 公里的探险历程。在旅途中，亨利·奥尔良还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1892 年，他再次出发到非洲探险，先后游历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1895 年，他重返亚洲，开始了从东京湾到印度的探险之旅。1901 年，亨利·奥尔良因染疟疾在西贡去世，年仅 33 岁。他的传世作品有《印度半年》《勇闯无人区》《东京湾附近》等。

1896 年，法兰西地理学会决定授予亨利·奥尔良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完成的从东京湾到印度的探险工作。在此次探险过程中，亨利·奥尔良有两位同伴，

即海军军官鲁克斯和东京湾法国殖民者布利佛。亨利·奥尔良沿途做了很多笔记，最后加工成《从东京湾到印度》一书。在该书出版前的1896年3月11日，亨利·奥尔良在巴黎索邦大学阶梯教室就此次探险活动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听众们几乎宗教般虔诚地倾听；大家激越地感受到叙述者的简洁质朴，优雅谦逊。大家一致认为‘他作为王子已经得到了最好不过的宽恕’，地理学会授予他的金质奖章和共和国政府授予他的十字勋章都是名至实归。”^①

在本次探险之前，亨利·奥尔良已经在中南半岛进行过两次旅行。亨利·奥尔良在游记篇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次旅行旨在探明北部中国境内的湄公河流域，因此其旅行的核心地区是云南省澜沧江流域。他希望对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因为这片地区也可能是未来法国商业发展的范围，基于这种考虑，三位旅行者先后考察了云南西部的许多重要市场，搜集了很多商业、地理、动植物、民族、宗教、人文等方面的第一手信息。沿澜沧江北上到达茨菇之后，他们决定尽量沿着察隅南部地区向西挺进，穿越了中国与印度之间600多公里的无人区，此前英国人曾经宣称这一地区是不能跨越的，而且这之前也没有任何欧洲人曾经涉足其间。在这片神秘未知的区域，他们跨越了很多河流，翻越了众多3000米以上的山口，一路从湄公河流域来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解决了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悬而未决的秘密，纠正了英国人犯下的某些地理错误。

亨利·奥尔良一行的出发地是东京湾。东京湾是北部湾的旧称，湄公河是澜沧江在东南亚地区的统称，安南是探险活动的起点，红河是他们途经的第一条大河。从红河逆流而上来到河口镇，便进入中国大西南门户，继续北航即到达重要码头蔓耗。在蔓耗弃舟登岸之后，亨利·奥尔良一行来到相对繁华的蒙自。蒙自是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和举足轻重的传教会活动地，也是本次旅行的首个中继站和作者眼中最后的相对开化的城市。亨利·奥尔良在蒙自组织起马帮队伍，马夫们也就从这里登台亮相，开始了他们奇异精彩的旅行生涯。从蒙自出发之后，亨利·奥尔良开始了漫漫西行之路，开始了名副其实的探险猎奇，开始了与各个部族的直接对话。他们先后途经绿春、江城的村村寨寨，最后来到思茅，进入湄公河流域，渡江之后从右岸一路北上，取道澜沧、双江、临沧、云县、昌宁等县，在昌宁附近再次横渡澜沧江，进入巍山县境内，最后来到洱海之滨的大理。大理作为中继站的地位十分突出，也是法国传教士的活动区域，亨利·奥尔良在那里得到了同胞们的鼎力相助。休整之后，亨利·奥尔良继续西进，途经洱源、云龙抵达澜沧江边，渡江之后来到怒江流域的六库，再沿着怒江东岸蜿蜒北行，随后翻越横亘于澜沧江和怒江之间的碧罗雪山南段余脉，重新返回澜沧江流域，从兰



坪向北攀行来到维西地界，最后平安抵达德钦茨菇。茨菇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驿站，需要在这里为后面的“未知区”探险活动做充分的准备工作。离开茨菇之后，亨利·奥尔良再次翻过双江分水岭，来到贡山境内，取道怒江河谷，随后把高黎贡山抛在身后，抵达独龙江流域。之后的探险则进入无人区，几乎人迹罕至，无路可通，高山相连，深谷交替，激流险滩，应接不暇，这也是整个旅途中最艰难的一段。最后，他们从上缅甸伊洛瓦底江水系历尽艰辛到达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系，这一段旅程可谓原始处女地，他们经历了缺粮的危险，大山的较量，毅力的磨炼，身体的考验。

从东京湾到印度，从太平洋水系到印度洋水系，亨利·奥尔良先后跨越五大流域，即红河流域、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伊洛瓦底江流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其中大小支流不计其数。在云南境内，他们先后五次横渡澜沧江，两度取道怒江河谷，翻越了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等龙盘虎踞的山系。在上缅甸地区，他们突破了莽莽群山，穿越了无数密林，最后到达印度萨地亚。在旅途中，他们经历了不同的地形地貌，不同的气候气温带，既有四季常青的热带地区，也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横断山区。他们的旅行路线呈逐级攀升的态势，从东南门户一直来到西北迪庆藏区。一路上，有的地方精耕细作，有的地方刀耕火种，有的地方大雪封山，有的地方春暖花开，亨利·奥尔良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农业种植与生态植被，该书可谓是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云南魅力的地理教科书。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灿烂多姿，风俗习惯千差万别，山寨村落星罗棋布，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踏上云南大地，亨利·奥尔良就把目光瞄准了当地饶有趣味的土著部族，关心他们的生活习惯，留意他们的宗教信仰，观察他们的饮食起居，审视他们的经济活动，考察他们的建筑艺术，打量他们的衣着服饰，比较他们的方言土语。该书以土著族群文化为主线，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缩影图，族群生活的大观园，19世纪末期云南土著生活的鲜活画卷。亨利·奥尔良用入微的观察和细致的笔调刻画了当地的各个族群，这是一种自然主义者的客观描述，亨利·奥尔良以西方旅行家的“他者”视角，给我们留下了特定时代、地域、族群的珍贵史料与素材。

从这部游记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民族的身影，如彝族、白族、哈尼族、瑶族、布朗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拉祜族、纳西族、独龙族，等等。云南的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同一部族的不同分支往往有不尽相同的细微差别，亨利·奥尔良着意考察、搜集这方面的情况，在书中描述了彝



族、苗族、白族等民族的不同支系，进而比较他们之间的各种差异。亨利·奥尔良对民族源流、迁徙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刻意关注他们的源流和演变情况，多有旁证对比和具体考证。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资料缺乏，加上翻译的中间环节，土著本身的百事无忧，抑或有些道听途说，书中无疑也存在某些谬误和语焉不详之处，但是作者秉承如实记录的态度，存疑留传后世。亨利·奥尔良一路风餐露宿，与土著居民零距离接触，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从当地民居入手，不管是茅房木屋、吊脚竹楼，还是装饰繁复的佛教建筑，简单朴实的宗教祭坛，他都细致入微地精心描绘，为读者复原和再现当时的境遇情状，使得读者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活的现场味道。亨利·奥尔良也特别关注土著居民的服装服饰，在描写各族群的服装服饰时可谓不厌其详，一衣一带，一色一调，一簪一髻，均尽收笔下。另外，亨利·奥尔良着意于介绍沿途居民的宗教生活，不管是基督信仰还是藏传佛教，不管是佛陀崇拜还是自然崇拜；不管是祖先崇拜还是迷信活动，他都挥洒笔墨、淋漓尽致地加以描写，刻画了土著居民的宗教心态和情感。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欣赏茨菇基督徒的无私友爱，可以感受部族中的超自然敬畏，可以领略土著居民虔诚的心声，可以身临其境体会祭师做场的阵势。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旅行家接触到不同的族群、支系、建筑、服饰、宗教等文化因素，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记录下来，对于今天的读者和方家学者来说，这是一笔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昔日旧影、老照片流行的年代，当我们重新捧读这些浸满历史的文字和图片时，扑面而来的是历久弥新的书香和“老照片”的吸引力。

亨利·奥尔良将主要笔墨用于如实地记录沿途的所见所感，他也通过不多的文字描写给我们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本次旅行的主体是三位法国人，其他都是手下的雇佣人员，如一直陪伴他们走完全程的两名越南人楠和邵。楠的形象十分鲜活，虽然貌不惊人，懦弱可欺，但他是尽心的厨子，忠诚的仆人，无忧无虑的天真汉，朴实厚道的老实人。他是大家打趣的对象，嘲笑的目标，可他的表现却总是不愠不怒，让人觉得可爱而有趣。与楠相比，他的同胞邵是个特别灵光的人，沉着冷静，主意很多，在旅行中的某些关键时刻，都是因为邵的出马才化险为夷。在亨利·奥尔良的笔下，两名安南人善良忠实，富有耐心，兢兢业业，认认真真，是让人满意的随从。在旅途中，读者会轮番结识许多汉人和土著，两位翻译官弗朗索瓦、约瑟夫以及马锅头等人的形象尤其鲜明。翻译官弗朗索瓦刻薄狡猾，鸦片鬼的外形和诡诈的内心相得益彰：“他骨骼高大，光光的脑袋黄里透亮，心狠手毒，虚情假意，睚眦必报。”弗朗索瓦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



一样，抽鸦片烟，身体虚弱，不能自拔；他工于心计，卑鄙龌龊，斤斤计较，挑拨离间，缺少人情味，对别人漠不关心。马锅头和弗朗索瓦有许多共性，他对利益趋之若鹜，见钱眼开，手段卑鄙，行为猥琐。马锅头则更加具有悲剧色彩，他的退场是以悲剧而告终的。弗朗索瓦更多的是让人瞧不起，让人恶心；但对于马锅头来说，除了唾弃之外，我们可能会在心中隐隐地升起几丝同情。马锅头是个要强的人，干活绝对是一把好手，从来不甘心落在别人的后面，腿上受了伤也都一路坚持。他同样爱财如命，唯利是图，钱似乎就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全部所系。“每当他一张开嘴，大家肯定就会听见银圆二字，银圆二字不停地从他嘴里蹦出来，就像泉水突突地往外冒一样。”第二位翻译约瑟夫是基督徒，旅途中他遭受了丧失爱子的打击，但依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气概，坚定勇敢地跟随大队人马继续探险活动。从茨菇出发以后，那些由土著居民组成的背夫大队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他们中间有藏族人、傣傣人、怒族人、独龙人，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他们也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勇敢奋进的气概，忘我的精神，尚或原始的集体主义情感。

通过游记中零星的描写文字，读者可以窥视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可以从中看出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高尚与卑劣，淳朴与狡诈，勇敢与畏缩。通过简单的人物形象勾勒，我们可以发现亨利·奥尔良在书中塑造了不同的群体形象：中国人（汉人），越南人，土著居民，基督徒。而在这些形象之中，他对中国人的批评尤为严厉，甚或带着不少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先入为主的“套话式”话语。考察个中缘由，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亨利·奥尔良与中国和中国人已经不是初次接触，虽然他已经具备了田野考察的感性体验，但是他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还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19世纪西方尤其是法国对于中国的集体想象的烙印。

我们可以看几段亨利·奥尔良对中国和中国人总体形象的描写文字：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们算领教了黄种人的麻木不仁和居心叵测，他们做事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简直让人受不了。”

“黄色人种真是冷酷无情，卑鄙下贱，人人自私自利，合伙欺负弱者。只要能找到替罪羊，自己不受牵连，个个都幸灾乐祸。”

“中国人就像这些野兽。……我们想赶开他们，很快又有一帮人聚集过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统治者！运用对待文明民族的办法，我们的外交官怎么能对付这样一个黏糊糊的民族？”

“中国人真应该重新正确认识自己。就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差不多了解他们，我真想逃出这个污秽龌龊的地方（中国），到原始民族中去生活，到没有信仰没

有法律的人群中去生活，到强盗土匪中去生活，他们至少有高尚的情操、自由的精神和个人的荣誉感。”

“有时候，我多么想离你（中国）而去，远远地躲开你，回到我们美丽的西方国度，回到高尚和充满希望、理想的祖国母亲怀抱。”

在描述中国形象的时候，作者使用了“污秽龌龊”这样的词语，而且他想“远远地躲开”这个与“高尚”“希望”和“理想”相对立的地方，甚至认为这里还不如“原始民族”和“强盗土匪”，作者对中国的心态直接投射到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之中。在描绘中国人形象的时候，作者使用了诸如“麻木不仁”“居心叵测”“冷酷无情”“卑鄙下贱”“自私自利”等色彩浓重的词语，也反映出他对中国汉人的蔑视心态。如果看一看从18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在西方和法国的演变情况，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亨利·奥尔良笔下的这种中国形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总的来说，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塑造了一个正面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如中国人富有教养、文明进步，君主开明贤达、爱护子民，国家政治清明、秩序井然，从而也催生了西方文学中的中国神话，而这些神话也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素材和武器，因此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在18世纪的西方广为传播。到了19世纪，尤其是1840年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开始出现大量的中国游记以及由此诞生的虚构作品，这些作品的目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要清算18世纪由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出来的美好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也由喜好转向厌恶，由崇敬转向诋毁，由好奇转向蔑视。因此，在这个世纪中，西方人通常使用“野蛮”“非人性”“兽性”等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人，而且经常将中国人群与动物作比，如“蚂蚁”“猴子”“豺狼”等。亨利·奥尔良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可谓与这个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脉相承，它折射出世纪末期欧洲人的发展方向，“由于它对欧洲人所具有的劝诫作用，中国人形象就更镀上了一层晦暗而令人生厌的色彩。这其实就是这些世纪末法国小说的真正功能，它们争相挥舞着这样一个丑恶吓人的中国人形象：退化、险恶、麻木、对自己的卑下一无所知”。而且，这种对中国的人描写，这种对中国人的恐惧，也正反映了世纪之交的欧洲人的忧患情绪，他们担心自己被出卖，担心失去对世界的控制，担心发现自我与原本的想象毫不相同。这种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种法国人对于中国的集体想象，这种世纪之交时期西方人的焦虑心情，都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亨利·奥尔良的描写文字中。^②

亨利·奥尔良以游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1895年的旅行生涯，其写作完全是按旅行的时间先后顺序而展开的，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流水账，在很多地方，作



者都进行了独特的评述和分析，字里行间浸润着他的感情和思想。本游记的文学色彩也十分丰富，可以说亨利·奥尔良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和诗人气质，他时常抒情感怀，或赞叹旅途的艰辛，或感慨自然的造化，或讴歌奔腾的大河，或咏颂高耸的雪山，可以让人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盎然兴味。

本书的翻译涉及很多专有名词，如地名、人名、民族等，译者力求保持当时的说法，故书中会出现某些历史上的地名或民族称谓，至于确实难以查找的专有名词，译者则采用音译的方法。此外，书中涉及的部族众多，奇风异俗不胜枚举，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所以翻译中谬误疏忽在所难免，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译者

2015年1月·北京

注释：

①瓦尔贝尔：《亨利·奥尔良王子新近探险之旅》，载《两个世界杂志》，1896年第四季度，总第134期，第687页。

②参阅米丽耶·德特利著：《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62页。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第一章 从东京湾到蒙自 / 1

第二章 从蒙自到思茅 / 24

第三章 从思茅到大理 /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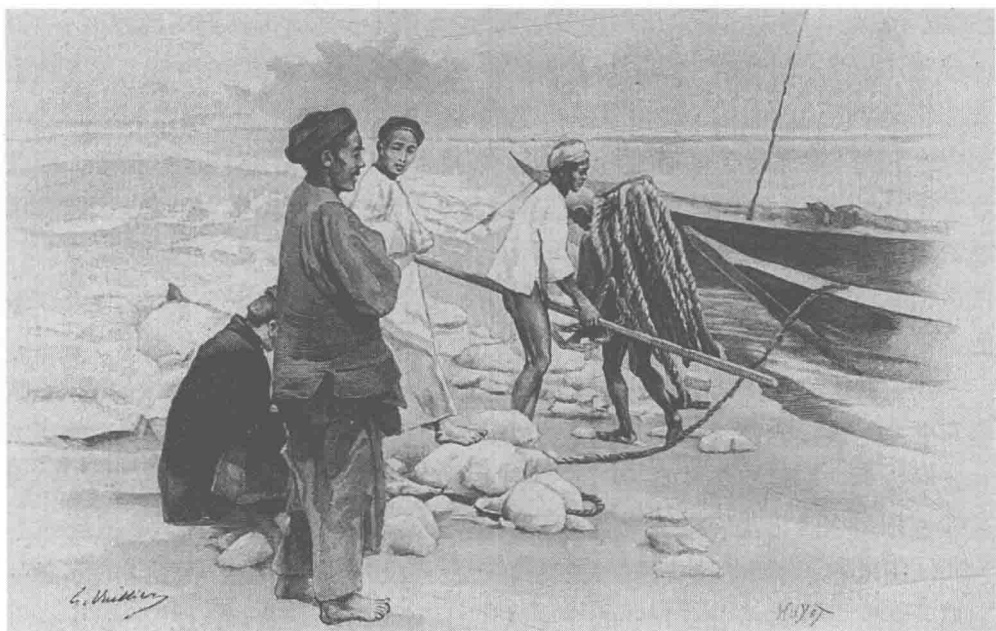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大理府 / 94

第五章 从大理到茨菇 / 104

第六章 茨菇逗留 / 157

第七章 从茨菇到坎底 / 172

第八章 从坎底到印度 / 228



红河岸边

第一章 从东京湾到蒙自

1894年9月13日，我和格朗梅松^①先生在马达加斯加旅行两个月之后，来到亚丁跟从法国直接过来的鲁克斯^②先生接头。

几年来，我们一直都有书信来往，从中我得以了解这位新搭档，我很欣赏他。对本次旅行的方式方法，要完成的任务，要达到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鲁克斯先生身为海军中尉，公务缠身，此前不能与我们同行，但大家毕竟都是老相识。当我告诉他准备再次旅行时，他马上决定请假与我同行。海军司令部准了他一年的假，虽然不发薪水，但是不影响晋级。我们三人结伴同行，年轻力盛，满怀激情，只想一往无前，为国效劳。萨加利安号轮船^③将我们带到印度支那。我们拿着地图，谈天说地，交相讨论，制订着我们的计划。

我出发时的初衷是通过本次旅行弥补在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知识的不足，尤其是想到安南山脉中去探险猎奇。然而，安南山脉已经开始为世人了解。最近除了

巴维^④考察团，博南、格里尔和奥当达尔^⑤考察团外，还有即将到来的德伯^⑥中卫考察团，这样地图上剩下的空白也就为数不多了。因此，我们的抱负也就更加宏大。北部中国境内的湄公河流域还不为人知。拉格雷^⑦和安邺^⑧未竟的爱国之举理应由法国人来完成，这确实意义非凡。在我们领土北部的中国境内探险，可以收集有用的资料，有助于发展商业、推行和平。我们探险返回时将不走原路，将沿湄公河谷地一路北上，直到法国传教士标注的中国藏区地界，然后再继续西行抵达印度。在地图上，我们满怀憧憬地旅行着。一想到要从一个陌生的地方返回，我们都很着迷，于是立即同意了这个想法。

我们就这样拟订了计划。在交趾支那、柬埔寨、马德望、吴哥以及安南徒步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以东京湾作为探险的起点。我们将沿着东京湾北部海岸和老挝边界，寻找湄公河进入印度支那的入口，也就是说在安邺离开湄公河不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将逆流而上，争取从河谷取道，以便记录下中国境内不为人知的地方。此次探险的目的地是靠近藏区的茨菇，传教士早已探明茨菇以上湄公河段。我们将会云南西部重镇大理稍做休整。返回时，我们将一路向西挺进。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行程。要做如此漫长的旅行，就必须百分之百地成功。我们有计划，有主意，有信心，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鲁克斯只有一年假期，根本就不够用。他想申请离开殖民部，那样就不会有假期的限制，假使政府愿意成全我们，接受这个申请，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功。

到达东京湾的时候，正值12月下旬，一个突如其来的残酷事实正等着我们。我们游览顺化的时候，格朗梅松先生要到香港去一个星期，但他却一去不复返，一场不治之症夺走了他的性命。死神击垮了这位同伴，我们不禁怅然若失。

请让我遥祭这位勇敢者吧！他年纪轻轻，出身名门，有家有业，却愿意与我一道旅行，可能他私下的心愿是有朝一日到某个殖民地定居，做些有益的事业。可怜人啊！你的名字将永远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戴，你是忠实的伙伴，可靠的朋友，你有着金子般的心灵。逝者已逝，只有靠生者加强团结来弥补其中的空白。鲁克斯得到通知，殖民部批准了他的申请。本应该由三人齐心协力完成的事情，现在只得由我们两人来努力了。我们定下目标：决不犹豫，必须成功！

我们开始准备行囊。鲁克斯先生奔赴香港，去办理格朗梅松先生扶灵事宜，顺便采购一些物资，向对西藏了如指掌的传教士德格定^⑨先生做些咨询。我则待在顺化，准备行李，招募人力。恰恰在这时候，我们的队伍如有天助，又添了一位新搭档。布利佛^⑩先生是第一代殖民地移民，在东京湾已经居住了十一年时



间，他本该返回法国，把事务交给合伙人来负责。布利佛先生骨子里爱好旅行，我们的决定正好也吸引了他，他提出要跟我们同行，要向我们学习。我不禁想起邓肯^①神父，六年前当他要离开西伯利亚边界返回比利时的时候，想跟我们绕道返回。谁知道这一绕，取道中亚和西藏，历时整整一年。布利佛也点燃了圣火，跟邓肯神父以前一样。

有多少这样的法国人啊！他们心底满怀献身精神，一腔如火的热情，几分无畏的劲头，只需一点火星便可迸射出来。他们寻找机会展示自己，奉献自己，不为名利，这些慷慨的法兰西儿女啊！祖国为他们的奋勇向前而自豪！他们或许正行迹天涯，身陷囹圄，没有欢乐，只有孤独、勇气和忍耐。

布利佛在东京湾受到广泛爱戴和尊重。他深谙旅行的种种滋味，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健康的身体、万丈的豪情。我们张开臂膀热烈欢迎他加盟。

1月26日早晨，我们离开河内，向云南进发。除了我们三人，我们的队伍还包括四名男子。首先是一名矮个子越南人，他有着宽宽的脸庞，扁平的鼻子，大大的嘴巴，有点像狮子的嘴脸。他是我的老熟人杜，一个爱慕虚荣的好小伙儿，他得意洋洋地摇着头，自称见到美色就按捺不住。他并没跟我们走多远的路，我倒也并不后悔，他身体不够结实，做不了这种旅行。他走到安沛省就痛苦不堪地离我们而去。邵生得人高马大，有棱有角，他已经陪我去过一趟曼谷。他天生性情独立，脾气暴烈，打猎是一把好手，枪法很准，准备工作特别卖力。他像猴子一样机灵调皮，办事能干，好多次进退维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帮助都至关重要。邵沉默寡言，不管是高兴还是幽默，都只无言一笑，露出两排黑黑的牙齿。如果谁不对他的口味，他就会瞧不起地来一句：“他真傻。”

楠是我们的厨子，跟邵截然相反：矮个子，灰不溜秋，懦弱谦卑，外号叫呐默。他心眼很好，办事耐心，理所当然很快就成为全队的小丑角色。他常常受到大伙儿的嘲弄，但他跟大家关系很好。他单纯朴实，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下去，始终平静地看着风物的变幻，居民的更迭，毫不关心到达什么地方，究竟去哪里。他按时做饭，自始至终都一样认真。只有烟草匮乏的时候，楠才会觉得难受，心烦意乱。单从招募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在西贡的一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光景，我们正急着物色厨子，中午我们就得出发去安南。有人带楠来见我们。“你想去吗？”“嗯，给我四个小时，就可以准备好。”“不行，两个小时后就动身。”“可以，我这就回来。”当初本来只打算雇佣他几天时间，没想到这个西贡人一来就与我们长相为伍。这个亚洲土民有着高尚的情操。楠是名鳏夫，有三个十分疼爱的孩子。他想多走些路程，多干些活，为他们多挣些钱回去。



除了越南同伴（老五，老六，老三，孩子们很少有名字，直接用数字区分就行），我们还有个中国人，他骨骼高大，光光的脑袋黄里透亮，心狠手毒，虚情假意，睚眦必报。他就是我们的翻译官。弗朗索瓦法语讲得很棒，还有在船上当伙夫的证明，也有在锦普矿区的工作证明。我在凉山找到他，马上就雇佣了他。在东京湾，要找一名会讲云南话的翻译实在不容易，云南地方官员讲的全是方言。我们要去的地区，广东话根本派不上用场。两个月之前，我就给东京湾这边写信，想找一名翻译，但还是只能找到这么一位。他吸鸦片，漫天要价，说一路要坐滑竿旅行。我实在不敢恭维弗朗索瓦，但也只有忍气吞声接纳他。

我们的行李很多，达巴帝^②先生为我们提供方便，免收了一笔昂贵的超额税，这真让人高兴。我们把行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身携带，另一部分直接从蒙自寄往大理，作为储备。

1月29日，到达安沛，旅途很惬意。两个朋友为我们当向导，船上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气氛。

1890年以来，安沛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轩敞的石房子已经取代高耸的茅舍，漂亮的屋宇拔地而起，围成小小的一圈。大伙儿歇息的时候，我游览了安沛上游七公里处的达巴帝煤矿。煤矿沿河分布，直到朗盖地界，煤质很好，可燃物占到20%—30%，而锦普煤矿的煤只有10%—15%。安沛附近还发现了石油，还有一名工程师刚刚租下了石英矿。

休整两天之后，我们登上一艘吃水仅70厘米的小船，这大概是小船的最后一次航行，能不能抵达老街都很难说。我们按时上船，辞别了热情接待我们的朋友和官员。

几天之后，我们就将看不到三色旗了。眼下，我们正在跨越从文明开化走向原始自由的地区。我们马不停蹄，想急于感受一下：叼着烟斗，跨着坐骑，到陌生的地方看人所未见的东西，当下的感官掩盖了明日的茫感。同伴和我一样，都急切地想往前赶。

在红河逆水行舟，真是心急船慢！小船在沙滩上连连搁浅。我很佩服灵巧机智的船工。他们（十二名安南人）全都下水，在船头的不同方向用纤绳拉船，另外还有个中国人掌舵。舵手每月三十五皮亚斯特^③，头等船夫三十五皮亚斯特，司炉工十三皮亚斯特，其他船员一律八皮亚斯特。有时候，我们花五六个小时也只能前行一百来米。时停时走的间隙，我就到河边清洗衣物，沙滩上散落着数不胜数、色彩斑斓的石子和碎玉。

水渐行渐浅，船越走越慢，从安沛到老街用了五天时间。小城依然如故，红